

1985年后中国文学的一个侧影

宗 诚

尽管鲁迅先生早就批评过中国人的“十全病”，但诸如“十年”这样的数字，仍然具有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因此，还在1985年，中国的文学界就开始认真而隆重地准备“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了。

所谓“新时期文学十年”，大体指1976年至1986年这一期间。在“文革”后的废墟上启步，并且要冲开一个个禁区，这十年中国文学的行程当然充满艰辛。尤其是其中的创作中坚力量，即王蒙、张贤亮、刘心武、张洁等四、五十岁的作家和张承志、贾平凹、史铁生、王安忆、梁晓声等三十几岁、有过“知青”生活经历的作家，他们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都是在经历种种非议、指责之后才慢慢被社会公众认可的。但到了1984年，亦即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后，中国社会的人文环境毕竟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绩、尤其上述两类代表性作家的创作实绩，无论在官方还是在社会公众方面，都获得了肯定性评价。

然而，1984~1985年间中国人文环境的自由宽松气氛，说到底还只是一点点气氛而已。社会管理体制与文艺管理体制并无多大改变。比如作家仍然作为公务员（而非自由职业者）而被置于一定的组织中；作家的团体仍然作为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一个部门而存在；作家在获得文学荣誉的时候常常也同时获得官职等等。最成问题的大约该算是杂志一律属于国营或曰官办，同人的民办刊物绝对不被允许。这便注定了真正的自由创作，多元声音的局面无法形成。如果翻阅一下这一期间的主要文学期刊，可以看到上述两类已经获得荣誉和名声的作家的名字出现频率相当频繁。尽管有的作家的创作已经风格定型化，很少创意，但各文学杂志仍以争到这些名家的稿件为荣。而当时的文学评论界，则几乎众口一声地称赞着新时期文学成果辉煌。比起以往的“左”的批判文章来，文学评论界的变化和进步当然是不需怀疑的，但严格说来，不也存在另一形式的刻板和单调吗？

1985年秋季，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编辑的我，和另一位朋友南行上海、福建等地。我们有意避开向知名作家们约稿，而侧重向大学的文科学生和社会上的文学青年调查。结果看到与当时文坛颇不相同的景观。我们调查的对象大都属于50年末期和60年代初期出生的青年，他们有幸在社会比较安定的环境里进入大学，接受较正规、完备的文化教育，正如一位青年诗人所描述的

那样：“这是一群不规则的雕像 / 缓缓地上升着，波动着 / 年龄，学历和梦。”“那褪色的挎包里 / 正装着一本《拓朴学》 / 一瓶奶浆 / 和一个戴博士帽的幻想。”（宋琳：《台阶，升起一群雕像——写在我的大学》）他们很少艰辛的生活经历，却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外国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因此，他们评价作品的眼光，便与当时文坛的评论家们颇有距离。当时的评论家较多从中国新文学史的纵向历程上考察新时期文学，与“文革”前乃至“文革”期间比较，自然容易获得肯定性结论；年轻的大学生们则较多从世界文学、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着眼对新时期文学作横向考察，于是，能够让他们钦佩的作家便只有马原、莫言等有限的几位。对于张承志，他们不喜欢他的充溢浪漫英雄气息的《北方的河》，而赞赏他的《糊涂乱抹》。而年轻的文学青年们最不满意的是文艺管理体制（特别是刊物官办体制），他们干脆自己动手刻印诗集、刊物。1985年大约是这种民间同人性文学杂志最盛行的一年，可能不少于三、四十种。

而这一代青年人的情绪终于要反映到文学界。这反映的第一声大约该算是刘晓波的《论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危机》。《危机》一文其实是一篇讲演。1986年的夏秋之交，经过认真准备而如期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上，刘再复做了以“新时期文学的主流”为题的长篇报告，以人道主义为标准，高度评价了新时期十余年的文学成就。这也几乎便是那次讨论会的整体基调。会议快开到一半，刘晓波发言，以非常尖刻乃至粗野的语调，对刘再复的主题报告提出反论。在他看来，新时期文学并非象刘再复以及其他评论家们描述得那样灿烂辉煌，恰恰相反，多数作家仍然囿于传统文化（或曰封建文化）的思惟模式中，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是仅得皮毛，失去精髓，成为不伦不美的东西。刘晓波进而讥讽刘再复据以立论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浅薄的、陈旧的思想。

不必说，由于刘晓波的《危机》只是一篇即兴式的发言，论证的不严密，论据的不充分，几乎随处可见。但《危机》的意义在于：（1）在习惯于一种声音的中国文学界，痛快淋漓地提出反论，有利于引发多种声音争论的局面。（2）《危机》，为当时文坛的过分乐观的情绪泼了冷水。（3）《危机》对当时的知名作家逐一评点，不留情面，极大地动摇了当时文坛已经渐趋稳固的结构，从而为更年轻的作家们登场创造了一种气氛。大约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尽管《危机》一文在当时的关于“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的报道里，只被轻描淡写地提到几句，而未能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但后来在南方的《深圳青年报》上发表后，却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上海的评论家吴亮曾撰文评述，

称之为“刘晓波旋风”。

也就在这一期间，一批更年轻的作家成长起来。除了已经颇为知名的莫言、残雪、刘索拉之外，还有王朔、刘恒、徐星、余华、苏童、格非、吴滨、孙甘露、洪峰、刘毅然等。尤其是后一批作家，人生观与艺术观有许多近似之处，因而，1987年底由王朔领衔发起成立“海马影视艺术与文学集团”的时候，这批作家的一部分便成为主要参与者。他们所接受的文学影响，主要是欧美现代主义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他们不把小说为反映社会内容或表达作者理念的载体，而更重视小说本体乃至文学语言本体的意义，甚至陶醉于小说叙述方式或语调语感的生成过程中。这在格非的《迷舟》、《青黄》和余华的《世事如烟》中表现得极为充分。他们热心于小说艺术的实验，但并不想成为与读者隔绝的孤独的前卫，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创作能获得众多读者，并且努力寻找与读者沟通的途径。“海马集团”的成立，便是希望文学与现代化传播媒介电影电视联姻。并且，他们的努力已经获得初步成功。1988年底至1989年初，在北京引起一定轰动的电影如《摇滚青年》（刘毅然编剧）、《顽主》、《轮回》（王朔编剧），大都是“海马”作家的作品。与王蒙、刘心武乃至张承志、梁晓声等作家相比，“海马作家群”对文学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等是漠然轻视的，这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耽于艺术而忘记了人生，恰巧是因为他们对人生看得太透彻（这或许与他们的年龄并不相称），即使是他们当中比较接近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家，也总是由具体事象而去探究生、死、性等形而上的问题。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对人生终极的悲观构成他们作品的普遍的虚无倾向。而终于不能脱离俗世的根性，又决定他们对卑俗的环境并不采取决然对抗的形式，而是冷嘲热讽。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极为相似，都属于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归宿的精神流浪汉。既对专制不平，也对自由报以怀疑的冷笑。或许正是这样原因，这批作家大都没有直接介入五、六月的学生运动。

“海马作家群”基本上反映了新进小说家的创作倾向。但在报告文学领域，则是另一番景象。直接接触社会、政治、历史、风俗、文化等方面重大题材，蔚然成风。代表性作家有戴晴（《王实味和〈野百合花〉》等）、苏晓康（《自由备忘录》）、赵瑜（《兵败汉城》、《强国梦》）、徐刚、麦天枢等。这批作家干预社会的热情有的甚至压倒艺术热情。因此，也比较多地参与了北京天安门运动。

至今我仍然不甚明了的是刘晓波在六月风波间的态度。就性情、气质、人生观点来说，他更接近“海马”的一群。据说，“海马”成立时曾邀他参

加。但他更强调个体的力量，不愿意加入组织，哪怕是朋友的同人组织，为什么在五月间他那么坚决地从美国返回北京？我当然不相信他是受了什么组织的委派，那不符合刘晓波的性格逻辑。但我不清楚驱使他的内在的动机。毕竟，我们快两年没有见面了。1988年夏，他去挪威、美国讲学的时候，我恰巧在外地，回北京后收到他临行前送我的一本书，即那本《批判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后来又收到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类的自由》。这两本书就放在我的书架上，当然，其他的朋友的书架上也会有的。最近，接到一位朋友抄来的诗作，其中也提到晓波（朋友间更喜欢叫他黑马）和他的书，就抄在下面吧：

草原上自由自在的黑马，
转眼消失。
冬天随风而来，
我们坐在冬天里，
任风撕碎，
甚至无力拥抱。
朋友的书就放在书架上，
我们谁也不去惊动它们。

（附记：对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应该作认真的研究才能发表议论，但这不是我现在的条件和条件所能允许的。那么，确实不应该在这里胡说八道。但当我想到东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诸位先生，特别是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研究会的研究热情和青春气息，我又感到不能不说点和写点什么，参加他们的讨论。尽管我说的和写的，肯定有好多悖谬。）

（本稿子收于1989年11月）

文学报 1989.10.5



巴金文学研究所在泉州成立

本报讯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国大陆第一家“巴金文学研究所”不久前在泉州黎明大学成立。全国政协委员梁披云题词：从巴金的人研究巴金的文，从巴金的文研究巴金的人。”

该所将编辑出版一份季刊《巴金文学研究资料》，同时正着手筹建巴金文学研究资料库；建立与国内、国际上巴金文学研究者的信息网络，收集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争取在条件成熟时编辑出版《巴金文学研究论文集》。